

知困轩中国现代文学论稿

李伏虎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困轩中国现代文学论稿/李伏虎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3

(西北民族学院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文库)

ISBN 7-105-04984-7

I. 知... II. 李...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596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由《语丝》和《湖畔》想起的（代序）

决定油田高产与否是地下含油沙层的厚度和原油流动性的好坏。中东的油井一经钻成，几十年如一日自喷不断，而我们中国的大部分油田，有控制的自喷一两年，就需要在四面打8个注水井注水加压，才能用抽油机抽出少量原油，这个井就枯竭了。一个人一生成就大学问，必须有三个条件：良好的遗传和早年教育、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意志、提早充分准备和抓住时代机遇。有了这三条，就如中东的高产井一样，成果就会像井喷能持续大半生。像我这样既没有良好的早年教育，又懒惰而缺乏毅力，命途多舛的人，如若能及时发蒙加压，也还可喷几天，出些许成果。可是正当我在井喷的年龄，却无人开凿与加压。这正如王充的人才理论一样，人生好比随风飘落的种子，落在良田沃土，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落在贫瘠沙漠，长成一株小草也不容易，埋没的往往是绝大多数。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写于1966年5—6月，当时刚刚大学毕业。这年5月1日前，我们已经结束了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一应考试，外出进行第二次教育实习以等候毕业分配了。当时，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斗争方兴未艾，我选择了较难的题目。将吴晗大半生有关朱元璋的三本著作《从僧钵到皇权》、《朱元璋》、《朱元璋传》以及有关明史研究的论文都读了，写出了一篇七八千字的《评〈朱元璋传〉》寄《光明日报》而石沉大海。第二篇学术论文写于1973年，当时应《甘肃日报》负责人刘爱芝同志之约，要我写一篇有分量的“批林批孔”的文章，我没有资格参加任何三结合大批判组，而是单枪匹马进行，这篇文章我下了大

功夫,《论语》、《孟子》、《韩非子》、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杨荣国的《中国哲学史》都读了数遍,反复若干遍,终于写成了一万五千多字的长文《孔子——历代统治阶级的忠实牧师》,但未能发表。

教了10年中学,也曾任过几年副校长,1978年调入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该院“文革”中被撤消,重新恢复,我权衡自己傲上、坦率,当官不行,只能教书。自己热衷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然而调入后却不得不去教逻辑学、古汉语。因为民院1950年开设的汉语系有三个专业:蒙文、藏文、维文,是双语专业,即招收汉族学生学习三个少数民族文字,培养翻译人才。1978年民院复办后,蒙文、藏文都新设了系。新设的汉语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相当于大学中文系本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另一个是维文专业。当时,一些学过维文、藏文、蒙文的同志民族语言丢了,现在到汉语专业来教书,他们大多数逃古的和洋的课代。领导说我学中文什么课都可以代,好不容易到1982年我才被分配教当代文学,因为怕犯错误,这门课没人代,直到1991年我才开始教现代文学。

我在去教室上课时见熟人问我干什么去,常常回答是:“拉长工去!”我的长工是教书,而短工就是写文章与编书。这就像一个泥水匠有时也干干木活和瓦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投稿还退稿,后来不但不退,没有熟人就有可能发表。由于天分不够,又加上懒,有时看到报纸上讨论某个问题,也手痒了,写稿寄去参与,有时稿子写成了,讨论结束了;有时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偶尔写成了,寄去了,退了回来。过了不惑之年后,就自愧自悔不敢去投稿了。因此,我打短工的历史如阿Q一样是一部失败史,这本书就是失败的记录。这里收集的文章连一篇“国家级”的刊物都没有,凡是没有注明发表刊物期数的均是退稿或胎死腹中的稿件。

由于学校与本省出版社很近，加上给别人帮忙编书时认识了几个年轻的编辑，一向反对自己掏腰包出书发表文章上名人词典的我，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决心编书，挣点稿费，这是我打的另一种短工。足见我的不识时务与不合时俗了。为此，曾下过很大的工夫，提出了不少大部头选题，然而很难与编辑们取得共识。好不容易通过了一本《中国现代名人演讲选粹》，印了3000册，要我发行，拉到寒舍堆了半间房子，四处求人，才卖出了六七百本，一位老同学同情我，将余书拉到两千里之外长城结束的城市，最后是一本未出售拉了回来。这时，一位同事下海开书店，经过两三年的折腾，书价飙升，我将剩余的两千余册书交给这位同事出售，由于书价低，居然很快售光。从此，倘出书要我包发行或部分发行我是决不干的了。接着这位老同事又要自费出一套丛书，约我编一本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的小说选集，50万字，但编成后他多次托北京一些圈内人士与作者联系版权问题，均无回应，于是，连复印费也赔上了。书出不了，文章发不了，赵姨娘当了15年，至今还扶不了正。

1994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看到张梦阳与人合译的美国传教士斯密士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写信给本省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推荐出版，他吃不准，却被敦煌文艺出版社的侯润章看到后要去了，还约张梦阳介绍了一本尤炳圻译的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一同出版了。这时，我产生了编一套“中国现代五大优秀杂文家丛书”的念头，当时我想约几个文学所的专家同编，写信给本省的出版社没有回音。

1995年春，侯润章征询我有无好的选题，我选了一个能出十多本的丛书，他答应得爽快，让我先编4本，每本印1万册，我不管发行。我刚开始工作，他就调到《读者》去了，我好不容易揽的这个大活搁浅了。到了1996年底，出版社在申报选题时又记起了我那本丛书。这套书共五本，每本二十多万字，共一百余

万字。虽然编选费只有每千字 10 元，但我又算找上了大活。花了两年工夫终于编完了。开始是林语堂的版权代理人找不上。后来我托张梦阳找上了，然而出版社不出《萨天师与东方朔的对话》即林语堂杂文选了，虽然他们给了我赔偿，然而一套丛书，未成完璧终是令人遗憾的。

每当文章发不出，编书找不到婆家，我就想起了《语丝》和《湖畔》。《语丝》是孙伏园《晨报副刊》的主编被刘勉己取代后，于 1924 年创办的由会员轮流编辑的一个同人刊物，凡会员每人出十个大洋，会员的作品编辑者不能删改，必须原文照发。正是这样一份没有主编的四开小报，为中国现代散文在“五四”时期的成就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贡献了三个优秀杂文家：周作人、林语堂、鲁迅。倘若不是自办刊物，像现在这样投稿不退，肯定他们都会自己搁笔。1922 年出版的《湖畔》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爱情诗集，作者都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他们自己组织了文学社团“湖畔诗社”，其中汪静之早有诗作发表，并结集为第一本诗集《蕙的风》，已放在出版社的案头，而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这三位共产党员，后二人还是宁死不屈的革命烈士，都没有发表过新诗，他们四个人，汪静之把《蕙的风》中的诗选出部分，与他们三人创作的编为一册，应修人、潘漠华出身大资本家，很有钱，自费出版 2000 册，一售而空，得到了鲁迅等一大批作家的好评，一举成名。要让他们一个个投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的稿，他们能在中师就成为诗人吗？

年青时不懂得学贵专精的古训，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知道，结果如一位朋友批评我的毁于杂了。原打算将古典文学、古代哲学、语文教学方面的文章也酌情收入，即使现当代方面的文章，有些年代久远我找不到了，有些成了断简残篇，有些不宜收入，最后还是割爱了。所收文章，无论发表与未发表，除了订正

少许讹讹外，一如其旧。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中国人对短暂的百余年历史却感到长，外国把 18 世纪以来的历史一律叫做现代史，而我们却要分为近代、现代、当代，近年来才有 20 世纪文学史的提法，我的文章就统名之曰现代。取孔子“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意，名曰：《知困轩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轩者，书斋也，教室也，我没有将自己的陋室名斋，名居，名室，名屋，名轩，名堂，名楼，名馆之雅兴。

20 年来在专业上写的这点不成体统的劳什子居然还能出版，使我一想起就汗流浹背，无地自容。然而契诃夫说得好，在文坛上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权利。对此次补贴出版这本书的院系领导，帮助我收集、整理、打印、校对的同事和同学，出版这本书的民族出版社汉编室与责任编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伏虎

2002 年 1 月 11 日于兰州

目 录

周作人与“五四”科学的性教育的提倡·····	(1)
周作人杂文与科学的常识教育·····	(11)
为民主和法治呼号的林语堂杂文·····	(19)
鲁迅杂文和改革开放·····	(27)
陈独秀“五四”时期杂文创作一瞥·····	(35)
梁启超晚年的德谟克拉西观·····	(43)
《中国现代五大优秀杂文家丛书》编选说明 ·····	(50)
《中国现代五大优秀杂文家丛书》编选缘起 ·····	(54)
中国现代演讲初创期历史的简要回顾·····	(66)
《中国现代名人演讲选粹》跋 ·····	(80)
关于《藤野先生》的主题·····	(82)
鲁迅小说的悲剧力量·····	(86)
反复手法的创造性运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写作特点 管窥·····	(100)
阿 Q——世界文学画廊中最复杂的典型 ·····	(104)
鲁迅弃医习文新论 ·····	(129)
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的艺术启示·····	(145)
《枫》剧是讽刺喜剧吗? ·····	(152)
蹇队长、公安局长和文学·····	(158)
三十年历史题材作品一瞥·····	(162)
短篇要短·····	(174)
喜剧的悲剧——从《西望长安》到《假如我是真的》看三十年	

喜剧发展的几个问题	(179)
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检讨——重读《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
“鸣放”前后徐懋庸文艺思想述评	(215)
论徐懋庸“鸣放”前后的杂文创作	(228)
《冬天里的春天》和《花园街五号》的浪漫主义倾向	(255)

周作人与“五四”科学的性教育的提倡^①

周作人在1944年写的《自述》中说过，“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的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斯的著作。”“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不但是俄国、东欧、日本、希腊文学的最早翻译者，也是人的文学，儿童文学，歌谣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妇女解放与科学的性教育的最早引进者，而科学的性教育的提倡始终是他最热衷的工作。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归根结底是一个提倡人的解放的思想运动，而人的解放是以个性解放为前提的，个性的解放是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前提的，这对当时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只能是一种“启蒙”，因而不久就被“救亡”取代。然而“五四”先驱们仍然坚信个性解放是一个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不可逾越的门径。而在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和科学的性观念的确立，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标志，而对于封建假道学的性观念及其集中

^① 该文是为《绅士与流氓的拼搏》周作人杂文代表作选一书写的原代序，后因周作人先生版权代理人周仲吉先生不同意，遂写了《周作人杂文与科学的常识教育》一文为代序。

表现——对人民实行禁欲主义和统治阶级自己的纵欲主义的批判，就是非常必要的。

周作人作为“五四”妇女解放与科学的性教育的首倡者是当之无愧的，他亲自参与了“五四”时期两次规模较大的有关科学的性教育的讨论，使性教育受到更普遍的社会关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惊世骇俗的《贞操论》，彻底否定了封建统治者强加给女子的无理戒律，是“五四”时期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重要战役，这一问题，由于胡适发表了《贞操问题》，鲁迅发表了《我的节烈观》参加讨论，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提倡科学的性教育的第一声春雷。

“五四”时期关于科学的性教育的讨论是“爱情定则”的讨论，发生在1923年4月中旬到7月中旬。《贞操论》发表后，周作人1918年到1923年2月曾经发表过《爱的成年》、《沉沦》、《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情诗》、《妇女运动与常识》、《猥亵论》等有关性教育的杂文，没有引起什么反响。1923年4月17日至18日，他在《晨报副刊》上接连发表了《结婚的爱》、《离婚与结婚》两篇有关性教育的杂文后，4月29日，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博士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挑起了“爱情定则”的大讨论，在该报上先后发表了近40篇有关文章，周作人也写了《重来》、《无条件的爱情》、《爱的创作》参加了讨论，而《爱的创作》可以看做这次讨论的总结。这次讨论的规模不亚于尔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而后者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参加，而“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周作人一个名人参加，他的魄力和勇气更是难能可贵的。周作人在《爱的创作》中充分肯定了张竞生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只见到张竞生君的一篇《爱情的定则》。无论他的文句有怎样不妥的地方，但我相信他所说的‘凡要讲真正完全爱情的人不可不对于所欢的时时刻刻改善提

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可得到了爱情上时时进化的快感，一可杜绝敌手的竞争’这一节话，总是十分确实的。但是道学家见了就着了忙，以为爱应该是永久不变了，所以这是有害于世道人心的邪说”。这次讨论曾经受到鲁迅的支持。^①

周作人关于妇女问题与科学性教育的杂文数量很大，不是一篇短文所可以概括的，然而，在仔细阅读了他这方面的杂文之后，就不难发现，他有关性教育的主要观点早在1918——1924年就全部提出来了，而后只是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当然，与其他众多新学科一样，他的观点全部是引进的。到了1925年后，他就把针砭的矛头对准充满中国朝野的不净观的封建的性教育观与假道学了。本文只就“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科学性教育思想作一简单的叙述。

爱情不是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相爱的双方要想保持永久的爱情不至于离异，就必须不断互相进行爱的创作与施与，这是“五四”时期周作人科学性教育提倡的第一个观点。

这一问题，以介绍日本女批评家与谢野晶子的《爱的成年》的同名杂文为代表。与谢野晶子认为，“普通的青年都希望一劳永逸的不变的爱，著者却以为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与谢野晶子认为，人心是经常变动的，因而要求夫妇亲子的爱永远不变是不可能的，她自己并且现身说法，“就我自己的经验上说，我们夫妇的爱情不知经过多大的变化来了。我们的爱，决不是以最初的爱一贯继续下去，始终没有变动的，固定的静的夫妇关系。我们不断的努力，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破坏了重又建起，锻使坚固，使他加深，使他醇化。……我们每日努力重新播种，每

^① 见1923年6月12日鲁迅致孙伏园信，《鲁迅书信集》上册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日建筑起以前所无的新的爱之生活”。这对于“五四”后刚从旧婚姻制度中走出的中国青年却把自由恋爱的结婚看成一劳永逸，永恒不变的错误不啻是一副清醒剂。

女性的真正解放的前提是经济的独立、常识的养成与性的解放，这是周作人“五四”时期提倡科学的性教育所坚持的第二个观点。

1918年10月，周作人在介绍1896年出版的英国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所著的《爱的成年》的同名杂文中指出：“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依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也是在这篇杂文中，周作人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蔼理斯（Harelock Ellis），他在其所著的《性的进化》中认为：“女子为社会生一新分子，于将来全群利害，极有关系，全群的人对于她，自应起一种最深的注意；古时孕妇有特权，可以随时进园圃去，摘食蔬果，这是一种极健全美丽的本能的表現。”

1923年1月，周作人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中，给妇女们开了一个能“知道你自己”的知识账单，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于人、生物、社会、自然的科学知识；二是关于数学、哲学等抽象的科学知识；三是关于文学、美术、音乐和艺术史的知识，并告诫说：“我希望现在主持妇女运动的女子和反对妇女运动的男子都先去努力获得常识，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与自然是什么，然后依了独立的判断实做下去，这才会有功效。”

1927年12月1日发表的《北沟沿通信》中，周作人对妇女解放的前提的看法有了新的改变，他说：“我不很赞同女子参政运动，我觉得有些宪政国里可以号召，即使成就也没有多大意思，若在中国无非养成多少女政客女猪仔罢了。想来想去，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

周作人根据奥地利维也纳鲍耶耳（B·A·Bauer）所著的《妇

女论》的研究，引用华宁格耳、《观佛三昧海经》、古希腊人的理想的女性标准及威尼斯地方谚语证明，男子理想的永远女性，“便是圣母与淫女的合一”。周作人指出：“鲍耶耳以为女子的生活始终不脱性的范围，我想这是可以承认的，不必管他这有否损失女性的尊严。现在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不肯承认了。其实，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假如鲍耶耳的话是真的，那么女子这方面及性的解放岂不更是重要了？鲍耶耳的论调虽然颇似反女性的，但我想大抵是真实的，使我对于妇女问题更多了解一点，相信在文明世界里这性的解放实是必要，虽比经济的解放或者要更难也未可知：社会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宽大，性生活也愈健全，而人类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却也最顽固不易变动，这种理想就又不免近于昼梦。”周作人在这里想要阐述的其实是一个未来社会的性与婚姻的形式问题，正如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说女子有种族的继续与个人的欲乐这两种要求，有平均发展的，有偏于一方的”，这就是说，女子性欲的强烈程度与男子一样因为种族、遗传诸关系因人而异，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对性的要求如同食欲一样，饭量大的人多吃一些谁也不会感到奇怪，这与周作人在这里所推崇的性的解放的意思是一样的。

承认人的性欲满足的合理性，承认人身体各部分包括性器官的美善洁净，批判形形色色的假道学的禁欲主义，是周作人“五四”时期鼓吹性教育所提倡的第三个观点。

在《爱的成年》中，凯本德“承认人类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一不美善洁净；他所最恨的，便是那‘买卖人类一切物事

的商贩主义，与隐藏遮盖的宗教的伪善”。认为“对于人身那种不洁的思想，如不去掉，难望世间有自由优美的公共生活”。在《结婚的爱》一文中，周作人警告那些灵魂不净观的人，告诉他们想看这本性交术的书的人，“便是要请他们在翻开书面之前，先检查自己的心眼干净与否。圣保罗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蔼理斯在《圣法兰西斯论》中说，‘我们现在直视一切，觉得没有一事实太卑贱或太神圣不适于研究的，但是直视某种事实却是有害的，倘若你不能洁净的看。’”

1924年2月，周作人在《读〈欲海回狂〉》这篇杂文中，向我们介绍了周安士著的这本小乘佛学对僧众进行“不净观”的性教育的教科书观点，“我要干脆的声明，我是极反对‘不净观’的。为什么现在却对于它这样的感着趣味呢？这便因为我觉得‘不净观’是古代的性教育。虽然他所走的是倒路，但到底是一种性教育，与儒家之密藏与严禁的办法不同，下卷‘决疑论’中云：‘男女之道，人之大欲存焉。欲火动时，勃然难遏，纵刀锯在前，鼎镬随后，犹图侥幸于万一，若独藉往圣微词，令彼一片淫心冰消雪解，此万万不可得之数也。且夫理之可以劝导世人助扬王化者，莫如因果之说矣；独至淫心乍发，虽目击现在因果，终不能断其爱根，唯有不净二字可以绝之，可谓禁得十分不如淡得一分也。论戒淫者，断以不净观为宗矣”。与这种“不净观”的古代性教育相反，“现代的性教育的正宗却是‘净观’，正是‘不净观’的反面。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做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是很污秽？倘若真是这样想，实在应当用一把静火将自己焚化了才对”。周作人指出“周安士知道人之大欲不是圣贤教训或因果劝戒所能防止，于是想用‘不净观’来抵御它……几乎与事实相背，其结果只成为一种教训，务阻塞而非疏通：凡是人欲，如不事疏通而妄去阻塞终于是不可行的”。

早在1923年1月发表的《猥褻论》一文，周作人介绍了蔼理斯这位英国著名的优生学及性科学的心理学者对于世俗对猥褻事物的态度的看法。蔼理斯在《随感录》中论及文学艺术中的猥褻分子时，他认为在当时的英国乃至全世界，人们对文艺所描写的平常大家看不见的人的身体的有关部位及行为表现出十二分的敏感，他引用了法国著名女演员伽比斯特回忆自己在伦敦舞台上演出时的景象“我穿紧身裤上场的时候，观众似乎都屏住气了！”而一些文艺作品由于少数猥褻的描写就屡屡被禁或删除后才能出版，这种情况，正是“由于缺陷的教育”造成的少见多怪，而猥褻的形式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蔼理斯希望有一天，“快活勇敢而且深邃的把人生整个的表现出来”，因此，他认为，“舞台上的纯粹裸体，要更多有使人清静高尚的力量”。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的《净观》一文，可以说是他提倡科学的性教育的口号和旗帜。他在介绍日本现代奇人废姓外骨所著的《猥褻与科学》时说：“外骨氏的著作，如关于浮世绘川柳以及笔祸赌博私刑等风俗研究各种，都觉得很有趣味，唯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所谓猥褻趣味，即对于礼教的反抗态度。平常对于猥褻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这三者都是对的，但在假道学的社会中我们非科学及艺术家的凡人所能取的态度只是第三种（其实也以前二者为依据），自己洁净地看，而对于有不洁净的眼的人们则加以白眼，嘲弄，以至于训斥。”在这篇杂文的最后，周作人表示了他坚决反抗假道学的决心：“中国现在假道学的空气浓厚极了，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就是青年也是这样，如批评心琴画会展览云：‘决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

中国社会尤其喜欢管不干自己的两性关系的闲事，并且无论法律、道德、舆论对这些桃色事件处分之严，全世界少有，归根结底是一种“狗抓地毯”式的“蛮性的遗留”，是应该借科学与艺术的洗礼予以革除，这是周作人“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性教育所揭示的第四个问题。

周作人早在1923年6月所写的《重来》一文中指出：“古人之重礼教，或者还有别的理由，但最大的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之过薄，这只要考证野蛮民族的实例可以明白。道学家的品行多是不纯洁的，也是极好的例证。现在青年一毫都没有性教育，其陷入旧道学家的巢臼本也不足怪，但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不幸罢了。因为极端的禁欲主义即是变态的放纵，而拥护传统道德也就同时保守其中的不道德，所以说神圣之恋爱者即表示其耽恋于视为不洁的性欲，非难解约再婚的人也决不反对蓄妾买婢，我相信这决不是过分刻毒的话。”

在1924年12月写的《狗抓地毯》一文中认为，野蛮人都有生殖崇拜的思想，“他们非意识地相信两性关系有左右天行的神力，非常习的恋爱必将引起社会的灾祸，殃及全群（现代语谓之败坏风纪），事关生命，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美国人摩耳（J·H·Moore）在其《伦理学》第五讲“蛮性的遗留”中所说的，只要了解“狗抓地毯”就行了。已经能在阔人家有地毯的房子中安睡的狗，在临睡时为什么要乱抓地毯呢？原来狗是狼变成的，在做狼的时候，终日奔走觅食，倦了席地而睡，然而山林中到处都是杂草，非得搔爬践踏过不能睡上去，现在成了贵族，有现成的地毯可以高卧，但是老脾气还是要暴露出来，做那先人们世代代野生时的动作。周作人认为，摩耳“这话的确是不错的，我看普通社会上对于事不甘己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证”。弗来则博士的《金枝》也有同样的意见，为此，周作人进一步指出，“社会喜欢管闲事，而于两性